



六四·三十年 深度

六四专访

六四报导在香港：抵抗时间流逝、采访管控和中央划线

“有些被访者二十周年时找到他们，廿五周年时已经不能接触到了。”香港传媒人如何年复一年讲述六四？我们采访了《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和《铿锵集》高级监制薛友德。

特约撰稿人 郑美姿 发自香港 | 2019-06-01



时间是记忆最大的小偷，报道六四的惨剧，一如跟时间竞赛。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香港电台《铿锵集》高级监制薛友德，上月突然收到消息——“张健死了”。2019年4月15日，张健乘搭飞机时突然昏迷，航班急降德国，张健经抢救后不治，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离开人世，时年48岁。

薛友德最后一次见张健，在十年前，时值六四二十周年。薛当时是《铿锵集》编导，跟同事潘达培抓破头皮，构思报道。两人翻查1991年播出的《铿锵集》，其中纪录八九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约有五百人。“二十年过去，他们想家吗？他们能够回家吗？”二人萌生了重访流亡者的念头。

这个六四系列报导最后以“回家”、“解结”、“延伸”和“守望”为题，一连四集播影，张健就出现在第一集“回家”里。薛友德回忆当日跟他见面，是在巴黎一幢旧式公寓的阁楼，“那是张健的家，十分狭小，但他似乎十分知足。”张健平日在唐人街一家烤鸭店为客人剁烧鸭，工余时间几乎都投身海外民主运动和教会的侍奉。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也是在这一块安全的天地里，张健才能透过网络“回家”，跟远在北京的母亲用视频“见面”。

与时间竞赛的六四采访

八九六四时，张健年仅十八岁半，是北京体育学院的运动员，在广场上担任学生纠察队的总指挥。六四凌晨，他在天安门广场向一个中校军官以死相谏，请求释放被抓民众时，遭军官连轰三枪，被送往医院抢救后，救回一命；但那颗射穿了左腿骨头的子弹，则一直没有机会动手术取出。张健随后用假证件在北京、东北和内蒙等地匿藏，12年后因参与一宗维权事件，身份不慎曝光，遂逃亡到法国。薛友德探访他之时，张健已流亡巴黎8年，更碰上他进行手术、把留在大腿里面足足20年的子弹取出来的日子，“我记得当时张健说，如果这是仇恨的子弹，希望就是最后一颗。”

鏗鏘集

薛友德最后一次见张健，在十年前，时值六四二十周年，更碰上他进行手术、把留在大腿里面足足20年的子弹取出来的日子，“我记得当时张健说，如果这是仇恨的子弹，希望就是最后一颗。”网上截图

那一集的“回家”，片末的镜头设定在北京：2009年的农历年三十，张健日夜惦念的母亲，在《铿锵集》的镜头前，把眼睛笑成一条线：“有时他想我想哭了，他一哭我就笑。我不跟他哭什么，我不让他掂挂。”说毕，张母静静地翻儿子的相簿，却泣不成声。一直很想回家的张健，在巴黎接受访问时，也在镜头前这样说过：“有时我太想家，跟妈妈说，不如我回去投降了？妈说，你要找一个很好的理由，如果没有一个让你良心过得去的理由，健，相见怜如不见。”

被镜头纪录下来的画面依然清晰，但转眼十年，张健已经离别人间。收到张健离世消息的当天，薛友德请同事把当年访问的片段剪辑，放上脸书以作悼念。张健遽然离世，也震惊了民运圈子，不能回家的他，只留下了最后一颗仇恨的子弹，送给了香港支联会的六四纪念馆展览。

这种年复一年插秧式的报道和记录，在不知不觉间完善了一幅更大的拼图、推开了一扇亦假亦真的历史之窗。

除了张健，还有曾经在1991年和2009年两次接受《铿锵集》访问的前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亦在2014年去世。陈是赵紫阳的智囊，因六四时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而遭通缉，被迫流亡美国。他同样于六四二十周年“回家”一集中出现，陈一直想家，终亦客死异国，终年78岁。薛友德说：“这些流亡者心里都想回家，但要回家，当局就会开条件，好几人因此宁愿不回。陈一咨当年亦靠不少人传过话，他曾收到信息表示可以回去，但再去到更高一层时，忽然就没有下文了。”

过去三十年，在华人国度，年复一年坚持跟进六四相关的人和事的电视台，大概越发稀少。这种年复一年插秧式的报道和记录，在不知不觉间完善了一幅更大的拼图、推开了一扇亦假亦真的历史之窗。不过只是身处其中的记者，大概没有为意。

其中很多珍贵的六四采访片段，诸如21名被通缉民运领袖名单中的项小吉和周锋锁，《铿锵集》亦有记录过；已去世的刘晓波被拘捕前，港台电视部的记者更曾拍摄了他六分钟的访问片段，成为了刘晓波在镜头下最后的定格。

时间是记忆最大的小偷，报道六四的惨剧，一如跟时间竞赛；距离八九年日子愈久，这场学运的见证者年纪愈大，能重现他们的机会就愈少。薛友德说，海外的流亡民运人士对香港记者都有特殊感情，缘于不少人当年经由香港出境，或曾得“黄雀行动”之助。“他们口中常提及，香港每年举办的悼念活动，竟从没停过。他们总是很感激香港记者，这么多年来仍然关注他们，会重访他们，只要不是立场已变，他们一般都很愿意跟记者再谈六四。”

关于六四最核心的集体回忆能否保存，当中有一种政治权力的角力

两个版本的六四回忆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荣休教授陈韬文，过去十年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合作研究，拆解为何三十年来，香港人仍对六四念念不忘，并烙印成一种集体回忆。陈韬文解释，其中香港传媒所担当的角色，甚为重要。

“关于六四最核心的集体回忆能否保存，当中有一种政治权力的角力；一般来说，政府和建制会产生主导作用。以内地为例，建制和民间主流的集体回忆往往一致，但在香港则相反。主流的六四回忆，不在官方，竟在民间。”但他亦不讳言，若把视野放大至整个中国，香港人对六四的集体回忆，以人数来计，则变成非主流的少数了。



陈韬文：若把视野放大至整个中国，香港人对六四的集体回忆，以人数来计，则变成非主流的少数了。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陈韬文指出，香港人今日的六四记忆，能跟北京官方的六四版本分庭抗礼，其实是有赖三十年以来，传媒和民间团体如支联会等的互为作用。他解释，八九六四的初期，中国政府试图用他们的宣传机器，去把事件改写，“官方的说法是，学生受外界颠覆、受外国煽动，强调的是民间暴力、军人被打，参与民运的民众试图颠覆共产政权。整个论述就是将责任放在学生身上，引证镇压暴乱有理。”

这种经改写的回忆在内地广泛散播，却没能改写香港人的主流记忆。陈韬文认为，香港传媒在其中的作用，饰演了“记忆动员”的角色，包括年复一年对于六四烛光晚会的报道，或者个别媒体逢五年和十年的回顾、跟进和采访。

不过陈韬文也承认，随时日过去，不少传媒的取态已有所改变，“八九年的时候，即使左派传媒都有派人到天安门采访，作出了很多报道。但事件过去后不久，香港左派报纸对六四已改变态度，采取了回避、封存策略，不再触及。加上香港很多传媒亦已被收编，又或者出于自我审查，因此媒体的力量确实是慢慢减弱。”不过，陈韬文认为，一些较亲中的商业报纸仍有报道六四的悼念活动，即使数量上很少，“也不是全部变成左报，他们能否过到自己那一关？他们的读者又是否能信服？报道的数量是少，是绝对比不上明报和苹果日报。”



陈沛敏：“我由做记者开始，看见前辈和同事是这样做，于是每年到时到候，你就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去报道。”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苹果日报的六四情意结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曾经在不少访问里说过，八九六四是他人生的转捩点，没有六四，就没有《壹周刊》。黎智英本来从商，是佐丹奴时装连锁店的创办人，六四时曾捐赠二十万件印上标语的恤衫，予参加游行的香港市民；其业务因而遭中央封杀，最后他只能把手头上所有的佐丹奴股份出售。黎智英赤膊投身传媒，其想法是信息能令人自由，《壹周刊》遂于六四发生后九个月面世（注：《壹》印刷版已于2018年2月停刊），而《苹果日报》则于1995年创立。

虽然这个老板的政治立场鲜明，但目前于《苹果日报》任职副社长的陈沛敏，却说出了发生在编采部的另一番景象。陈沛敏加入苹果日报23年，她由港闻版记者做起，至副采访主任、总编辑，现任副社长，曾于九一时赴美采访恐袭、也去过日本福岛的海啸灾区，并曾参与很多六四系列的采访报道。

八九六四时，陈沛敏正于香港中文大学工管系念二年级，也是学生报的编委。当年5月20号凌晨，电视播放北京宣布戒严的消息，住在赤柱的陈沛敏在电话里跟同学约定，立即前往新华社示威。那是个大风大雨的夜晚，她一边哭一边执拾出门，从不理政治的母亲，却没有出声过问半句，彼此心里知道，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

「并非有个人指住你要去做六四，却成为了一种内化的传统。」

《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

转眼数十年，六四已成为她职业上的内化价值。“逢五逢十，大家都自觉要较大规模去做六四题材。记得对上的二十周年，我和几个同事本来打算由五四开始，一直做到六四，如果能连续一个月，每日也有六四篇幅，已经好棒。”谁料他们愈做愈起劲，最后这个“六四系列”竟然由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开始，“动员了几个同事，每日最少刊登一版有关六四的报道，周围发掘很多不同人的故事，一直到做六月五号，报道烛光集会，足足一个半月。”

问陈沛敏报道六四题材，是不是收“柯打”必做，她说没有从上而下的指令，反而有一种前后相继的承传。“我由做记者开始，看见前辈和同事是这样做，于是每年到时到候，你就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去报道。更贴切的说法是，并非有个人指住你要去做六四，却成为了一种内化的传统。”



如果有一日《苹果日报》不再做六四的报道，陈沛敏相信读者会是第一个问“点解”的人。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曾经闹双胞胎的6月5日

她认为，如果有一日《苹果日报》不再做六四的报道，她相信读者会是第一个问“点解”的人。苹果日报自从创刊至今，每年6月5日皆以六四烛光晚会作为报纸头条，陈沛敏说，对上一个十年，时值六四二十周年，他们的头条便闹了双胞胎，“那时我不是决策层，不知道内部进行了甚么讨论，但报纸印出来后，就是烛光晚会的封面头条，以及李泽楷已为人父的头条，双封面。”

陈沛敏说，若非碰上六四烛光晚会，李泽楷必成头条，“但对我们来说，六四翌日的烛光照片，有一种特殊意义。但我相信，对其他报纸来说，则未必有这种‘六四’的考虑。”

不过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始终要衡量新闻的价值，“新闻始终要秤，一般来说，自会做六四烛光晚会。但若然苹果有一日放弃用六四晚会行头，必须有很大的理由去justify（合理交待）：点解唔做？那必定是有一单极具影响力、涉及很大公众利益的新闻发生。”

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传媒环境跟十年前相比，又起了更大的改变。陈沛敏直言，目前苹果日报已将更多资源投放发展网上新闻，即使是六四的报道手法，也跟以往不同，“例如今年的烛光集会，一幅相已经不够了，当晚更要在网上做live。网的同事也想出很多主意，四月已把‘自由花’重新编排，拍了一条三分几钟的MV，找童声演唱。另外又以旧曲新词方式，请港人合唱六四的回忆。”至于今年的六四专题，同样也是4月15号胡耀邦逝世之日开始，将会每日出版，直至6月5日。

最近几年，香港开始涌现“六四关我乜事”的声音，陈沛敏说，这也是他们要思考的问题。“苹果日报的报纸读者，年纪较大，未必有这个疑问，但苹果网的读者，就可能会出现这个想法。我们需要用不同的介面和手法去吸引不同读者，但对于一些完全不关心的人，自由社会就是有不同意见的人，我们也只能够继续做好本份。”

反而对于传媒因政治环境而噤声，她更为慨叹，“现在最常说的鼓励是：大家尽做啦！有得做就应该做，若果等到有一天六四成为敏感词，要打擦边球才能报道的话，那就太戇居了吧？”

六四两字比以前更敏感

其实，中大学者陈韜文亦有提出，香港传媒现今对于保存六四记忆的作用，已见收缩和限制，“因为权力转变，致媒体自我审查，对六四的报道就有所收敛。六四的敏感性已比以前更高，非常不利于集体回忆的承传。”

至于本土那种“六四关我也事”的看法，陈韜文认为，此亦是未来阻碍六四记忆承传的不利因素。“本土主义的兴趣，其实跟中国的打压，是连在一起的。香港人有本土倾向本是正常，只是不会变成一套主义。关键是当香港人失去了本来享有的高度自由，你愈打压，本土就走出来，令人愈觉得跟中国疏离，于是连带六四也会割离，因为事不关己。”

他认为，若要继续维系香港社会对六四的集体回忆，而不被另一种中国官方或本地左派所建构的六四版本取代，香港传媒以及公民社会，必须较以往三十年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捍卫。他说：“时间会把一切冲淡，这是不可违抗的自然力量，加上官方有意打压，以及有经历的人逐渐老去，还有本土的意识愈强，那六四的记忆更难承传。”



薛友德：“六四报道跟其他的采访不同，是一件几十年的事件，牵动的范围很大，每年再做都要思考不同的角度，检视它不同的意义。”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记者采访遭干涉和扣查

香港电台高级监制薛友德，回想过去多年处理六四系列的专题报道，也有类似感受。在他看来，中央对六四的管控似乎愈发收紧，六四似乎比以前来得更为敏感。“二十周年的时候，同事潘达培主要负责回内地采访六四异见者，当时的感觉是，环境相对宽松，只要有适当部署，媒体还是可以接触到死难者家属，甚至拍摄到他们到万安公墓拜月祭的镜头。”他续说，2009年之后，港台再于六四二十五周年时，派同事到北京做访问，情况已大为不同，“有些被访受二十周年时找到他们，廿五周年时已经不能接触到了。”

港台在六四廿五周年时，制作了“囚语”和“扎根”两个特辑，采访上也遇到莫大困难。其中访问北京民间智库“传知行”创办人郭玉闪时，记者甫抵达南京便遭便衣公安跟踪，最终被迫取消访问。但其实于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记者曾成功跟随郭玉闪到南京造访郭的六四启蒙老师；而同样于二十周年时访问过的六四死难者家属郝建，亦于五年前的五月，亦即记者的访问季节，突然“被消失”了。

薛友德直言，五年前那一趟实在是“很恶劣”，当日他收到新闻行家打电话去港台公关部，要求确认：“你们是否有记者在内地被拉？”今日回想，他仍显得忧心，“当时我未清楚情况，不能对外讲太多。”究竟实情如何？他说：“同事做访问时一直遭到内地部门的跟踪和干涉，试过在酒店被警告，另一次直接被扣查。”事缘记者当日跟天安门母亲新发言人尤维洁联络之后，就被公安指她涉嫌藏有危险物品，扣查了整整九个小时。

刘晓波的最后定格

作为主管，薛友德从不害怕同事退缩，却最担心他们冲得太前，他摇摇头笑道：“记者总是勇往直前，当他们认定那个值得做，就好尽力。你做主管的，就要提醒他们，始终我们最顾虑的是人身安全。很多事情不能预计，要有分寸，是否必须冒很大的险去做？是否一定要冲到最前才能看到，退后一些，是否也可行？”

薛友德1994年加入港台《铿锵集》，从助导做起，经历编导、监制，至今为高级监制，曾两次去到南亚海啸的灾区采访。他第一次参与六四报道，是九七回归那一年。之后六十四周年、二十周年、廿五周年等，他都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制作，“六四报道跟其他的采访不

同，是一件几十年的事件，牵动的范围很大，每年再做都要思考不同的角度，检视它不同的意义。”



1997年6月9日，铿锵集以《挥不去》为题，制作有关六四事件八周年的新闻节目，更找来司徒华为节目题字，原稿保存至今，摆放在薛友德的办公室内。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大型采访需要周详的规划和部署，但采访的念头很多时都是一念之间，“有时是当下一个moment你决定去采访，做了就是做了。过多几年，可能情况已不容许，当刻如果roll机记录了，片段就很宝贵。”他难忘11年前的2008年，就在《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被拘捕前两个月，有同事一念之间找他做了个访问，“那时也不知道是否埋到身，结果真的见到面，终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访问片段。”

那六分钟是刘晓波人生中的最后一个访问，之后不断被同行借用，“有些东西记录了，就是记录了。”

下一个十年，烛光不是必然

中大学者陈韬文和李立峰的六四研究，已进入尾声，陈韬文说，希望能尽快将报告书写成文稿刊登。问他这个香港版的六四集体记忆，未来将何去何从，他说，过去三十年来要维系这个记忆，本来已经困难重重，“过去也绝对不是一帆风顺，实际上考验亦很多。例如董建华回归时已叫香港人要放下六四包袱，然后是市民的淡忘，近年又屡受本土派的挑战，这些全是真实考验，香港克服过很多的压力之后，才有今日的状况，算是保存到六四回忆的核心部份。”

那么放眼下一个十年，将会跟香港已经历的十年，有甚么最大的不同？陈韬文提出了这样的忧虑，“很多年以来，本来香港左派报纸对六四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但近年起了变化。你看一些建制派的网页，如香港G报、港人讲地、帮港出声等，已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言论，例如控诉支联会‘掠水’，也多番输出诸如‘六四有镇压必要’的言论。”

现在中央也试图划线，如果把这条线再划去六四，传媒就必然受到影响。而且首当其冲的，也必然是香港主流传媒。

中大学者陈韬文

他直言，建制派在社交媒体这个新兴的空间，主动输出了很多亲中言论，造成了一个效果，就是令人觉得“六四也可以是有争议的，甚至是可以质疑的”。

香港社会目前所面对的形势，已不只关乎保存六四记忆的问题，而是涉及香港未来是否仍能享有高度自治、实践一国两制，让传媒和市民也能畅所欲言，报道或表达跟官方不同版本的事实和意见。陈韬文正色道：“现在中央也试图划线，如果把这条线再划去六四，传媒就必然受到影响。而且首当其冲的，也必然是香港主流传媒。实际上，已经有人试图划线，并以六四为界，例如谭耀宗去年已经提出，烛光晚会唱的‘结束一党专政’口号，可能违宪。”

下一个三十年，香港的六四记忆还是我们今日熟悉的面貌吗？陈韬文认为，若未来将按香港目前的轨迹运行，“我想，传媒和公民社会，都必须作出很大努力。”假如未来的政治气氛是加快收缩，比当下的运行轨迹跑得更快，“那么，要能继续以目前的方式来纪念六四，或是不可能了吧。”

六四30年



热门头条

1. 华为总裁任正非就美国禁令答记者问
2. 何边书：中美科技战，时代不站在华为和任正非一边
3. 关键合作方“断供”，华为真的准备好了么？
4. “我当时，可能真是做对了一件事”——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上)
5. 边缘化的六四论述：八九春夏，其实发生的是“两场运动”
6. 华尔街日报：华为崛起之路伴随着剽窃与不正当竞争指控
7. 香港记者陈润芝的六四记忆：“每隔二十分钟，军人就开枪，砰砰砰砰砰”
8. 被围困的六四论述，需与后冷战的时代光谱重新对接
9. 影像：台湾同婚合法日，超过500对同志伴侣登记成婚
10. 江河清：超越“亚洲第一”——同婚胜利之后，要继续做与说的同志平权

编辑推荐

1. 互动页面：工人、师生、母亲、记者——9个人的广场记忆
2. 经济不振、战机坠落、废钞失败，但“莫迪神话”为何屹立不倒？
3. 边缘化的六四论述：八九春夏，其实发生的是“两场运动”
4. 华尔街日报：华为崛起之路伴随着剽窃与不正当竞争指控
5. 多重曝光：十个镜头前后的八九六四
6. 专访吴国光：八九毁灭中国知识分子之后，如何继续“韧性的战斗”？
7. 72届戛纳影展主竞赛得奖作全点评：奉俊昊之外，影迷还可以期待什么？
8. 关键合作方“断供”，华为真的准备好了么？

9. 单云楼：“公知”任正非与华为的舆论胜利

10. 被围困的六四论述，需与后冷战的时代光谱重新对接

延伸阅读

商人、社工、民运人士，《逃犯条例》修订后，谁将成为“逃犯”？

“开头不会乱碰香港商人吧，但以后我们不敢有任何表态，连社交媒体、whatsapp都要小心。”

持续更新：打捞记忆，延续思考，三十年后的六四现场

端传媒记者走访巴黎、费城、北京、台北、澎湖、香港等多个城市，希望留住一个微小而重要的记忆盒子。

从“白宫战情室密件”一窥美国眼中的八九民运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Charles Sylvester在“战情室报告”形容这类反宣传活动为“中式人为洗白”。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甚至在另一份战情室报告中形容是“大谎言运动”。

专访吴国光：八九毁灭中国知识分子之后，如何继续“韧性的战斗”？

“可以說，我自己在推動中國民主化上是一個失敗者。但我這三十年就是承認失敗、但不放棄初衷。”

一个人的战斗，没有退路的吴仁华

吴仁华三本书最初都在香港自费出版，封面是自己用 word 文档设计，“很难看、很粗糙”。“三十年过去了，你出版那些受害者名录，谁会买呢？”